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如何传入中国

□ 李 臣

1917年11月7日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武装向圣彼得堡冬官发起总攻，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首的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于是日为俄历十月，故称其为“十月革命”。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光荏苒，今年是十月革命爆发105周年，就此，我们去追忆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以电报、新闻、见闻等方式在中国传播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关注，当时，这一消息主要通过电报、新闻、见闻等方式直接传入中国。

十月革命爆发当日，驻俄公使刘镜人曾在致北洋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表示：“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布尔什维克党）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在旦夕。”翌日，刘镜人再次向国内发送了关于俄国革命的电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不过，这则电文迟滞多日才被接收。此后，刘镜人持续致电外交部，报告俄国革命的进展。然而，北洋政府决定追随各协约国，拒绝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北洋政府的命令，刘

镜人等于1918年2月26日撤离圣彼得堡，之后，他们只能通过其他国家的驻俄使领馆得到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

11月10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和《申报》分别以《要闻·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及《战电》为题，对俄国十月革命予以报道。上述两原文载：“八日伦敦电：彼得格勒戎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七日俄京电：海军士率美克齐美尔党（布尔什维克党）之命令，携械占据俄国官立通讯社、电报总局、官银行、玛里官，临时国会即以该官为会所，今已休会。京中未起骚乱；八日伦敦电：路透社电接俄京官立通讯社电报谓：美克齐美尔党占据都城，已四处拘捕大员，此次主谋者为里林氏（列宁）……”此外，包括北京《晨钟报》、上海《时报》在内的多家报社均于11月10日刊登有十月革命的简讯。此后，国内各报社除了继续转载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外，还开始关注俄国革命的走向，“苏维埃政府颁布重要法令”“外国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红军与敌

作战”“白俄的溃败”等消息纷纷成为当时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新闻。

早在一战时期，北洋政府于1916年5月起，便开始向英、法、美、俄等协约国派遣劳工，其中，旅俄华工不仅要承担修筑战壕、装卸军用物资等危险工作，还须修建铁路、建设港口、开采煤矿，参与西伯利亚的开发等重体力劳动，惨遭剥削，所以劳工们大多加入了工会组织，尽可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此时，布尔什维克党频繁活动在劳工群体中，甚至有华工亲耳听到了列宁本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演讲，到了十月革命爆发当日，由旅俄华工组成的赤卫队直接参与了攻打冬宫的战斗。1918年初，外国武装干涉与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遥相呼应，而滞俄华工此时的生活处境亦极为恶劣，他们饱受压迫而无处申诉，又无法返回祖国，所以他们欢迎十月革命，同时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张，大批华工参加红军，将枪口对准曾经剥削过他们的旧势力。苏俄政权稳固后，红军随即迎来复原浪潮，其中便包括众多原滞俄华工。这些滞俄华工回国后，进一步向工友们传播阶级斗争意识和罢工思想，讲述参与俄国革命及作战时的所见所闻；另一方面，随着俄国旧势力的倒台，白俄分子到处逃亡，有的进入中国后，他们无形中亦间接传播了十月革命的消息。

作为理论思想传入

十月革命的胜利造就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自清末以来，大量中国青年东渡日本求学成为常态。正逢此时，流传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想

对这些中国青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使部分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他们当中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人物。十月革命胜利后，一直借助日本渠道观察和研究俄国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表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之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并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说；陈独秀则以极大的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表示：“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由其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更是在十月革命后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要阵地。

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随着民族独立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提出学习俄国的成功之道。正如邓中夏所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知识阶级思想为之焕然一新，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尚为德莫克拉西的宣传，继而为社会主义的研究，后来社会主义的信仰者日胜一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始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李大钊所撰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善安所撰《马克思主义（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李达所译《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二是涌现出一批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等为代表人物，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进步青年，更有一些从辛亥革命

时期一路走来的仁人志士的信仰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其中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为代表人物。三是一些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本土团体先后成立，如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等在武汉建立的利群书社；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亦有进步团体在此时开始朝向马克思主义迈进，如在1918年4月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可以说，这些团体为日后各地兴起的共产主义小组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开始进入到有组织、有计划的新阶段。事实上，早在中共成立前夕，党的早期组织即已选派积极分子赴俄学习，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坚持了这一传统。土地革命时期，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在苏区开办列宁小学、补习班和识字班等教育机构，建立红色报刊体系，编排红色文艺节目等均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工作。此外，中国共产党还相继成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之作，如《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进和完善这一理论……

今日，马克思主义已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在世界东方根深叶茂。

救济沦陷区流亡学生 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抗战时期的国立二十一中

□ 黄 伟

抗战爆发前我国并没有国立中学这一概念，各类中学一般是由地方自行创办。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流亡青年学生进入关内，如何安置他们成为国民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1932年，教育部在北平设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这是国立中学产生的开端。全面抗战爆发后，数十所国立中学先后成立。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这些中学一律依照数字命名，因而，设在安徽省太和县的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被命名为国立二十一中。抗战时期国立二十一中的建立，为救济沦陷区流亡学生作出了贡献，其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设过程

日寇在侵占中国大片土地后就实施奴化教育，如汉奸张岚峰在豫东地区没收英美教堂所办之教会学校后，就改建成伪华北中学，并以自己为校长招收沦陷区青年学生，以便实施“训练”。各级学校里，日寇规定日语是必修课，考试不及格就不能升级。在沦陷区的各种伪校中，由于奴化思想充斥着整个教学活动，学生的内心极端痛苦，因此，他们时常采取一些机灵的办来应对。“当时我们都说谁念日文，谁就是亡国奴。孩子们仅能以敷衍的态度表达反抗之意，好在授课者是中国老师，老师看我们不念日文书，也不好意思强迫。每届考试，全班拒绝作答，大家都得零分。中国老师只好叫我们重考，让大家抄书作答，所以求学期间既没有念日文，也没有念英文，就是念中国的古文。”

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未来社会的主人，如置之不理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重视对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救济工作。如蒋介石曾致电鲁苏豫皖边区的军政长官汤恩伯，要求“自沦陷区来归内移青年学生可先送西安中央战干团收容”。

其实，就鲁苏豫皖边区来说，当地游击区政府曾对教育采取了各种应变措施。1941年秋，原萧县县中改为临时中学，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学生白天上课，晚上分宿在农民家中。1942年初，萧县籍第三十一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苏豫皖边区挺进第二路总指挥王仲廉驻防皖北太和县，王仲廉向鲁苏豫皖边区长官汤恩伯建议创设边区战时中学，争取沦陷区广大青年，同时又可为国家“储备人才”。恰在此时，萧县县长王子石带领萧县临时中学迁移到太和并寻求王仲廉的帮助。于是，3月份王仲廉分别在皖北、豫东召开边区各县党政军联席会议。在教育方面，最终决定以萧县临时中学为基础成立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由王仲廉担任校长。具体工作方面，丁熙民负责全面工作，刘汉川、桑逸卿负责延聘教职员，李寿山、李厚庵分别负责筹备粮草和教室建设，同时还决定聘请河南开封师范执教的朱全圃负责教学工作。4月，战时中学筹备处在太和县的徐禅堂正式成立，计划招收学生500名，并定6月2日开学。

在大量招收学生的同时，王仲廉一方面请第三十一集团军招训处拨款解决学校经费，一方面电请教育部给予帮助。7月，学生入学后，为解决校舍问题，王仲廉决定在太和城内征用“山西会馆”和部分公用空房，改建校舍。8月，教育部刘季洪到皖北视察，王仲廉向其表示希望战时中学能改为国立中学，9月教育部同意鲁苏豫皖边区战时中学改名为国立二十一中。10月初，山西会馆改扩建工程完成，校本部迁入山西会馆。10月10日，国立二十一中举行开学典礼并挂牌仪式，王仲廉到校发表讲话，此后学校走上正轨。

1944年1月，教育部任命朱全圃为国立二十一中校长，中原战争爆发后皖北的太和成孤岛。6月，朱全圃从重庆返校，不久教育部电促学校尽快西迁，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人分批，路分段”西迁，第一批先到镇平，待二、三批到后再集中西迁安康。9月10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因学校要西迁，学生焦躁不安。朱全圃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国难当头，时局

紧张，我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来和大家在一起的……我会和全体师生员工一道，同命运，共患难，生死与共的，希望大家信任我，帮助我，共渡难关。”10月11日，学校组织第一批学生西迁。12月4日，朱全圃带领第二批学生出发。第二批同学走后，李厚庵主持校务。随着中原战事结束，皖北一带又进入相对平静时期。

1945年2月，教育部任命王仲廉为国立二十一中校长，6月14日，学校高中部第一届高中生在陕西山阳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人宣读王仲廉的训话，其勉励学生说：“深望诸生珍重前途，期成远大，庶不负国家教育之恩，即本校诸师友均预有光荣焉。”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在陕西山阳、蓝田及皖北太和的国立二十一中学生欢呼雀跃，庆祝胜利。1946年7月，遵照教育部国立中学复员办法，国立二十一中返回江苏后改为省立“连云中学”，非江苏籍员生各返原籍“就业就业”。在陕西的校产由留守人员造册移交当地驻军。在太和则由李厚庵造册全部无偿移交给太和，此后安徽省在此基础上创办省立太和中学。

教育特点

国立二十一中是抗战时期由鲁苏豫皖边区在敌后建立，并直轄教育部的一所特殊战时学校。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该校学生的生活艰难，学习条件也十分简陋。在其短暂存在的几年中，国立二十一中的教育特点都非常鲜明。

首先，注重知识的传授。在艰苦的岁月中，国立二十一中为培养学生早日成才，制定了各种促进人才成长的机制。例如，教师认真备课，各种教学活动也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引导学生面对烽火连天的祖国，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呼唤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教学实践中，由于该校教师都是博学之士，因此他们多方面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如语文老师翁世晋讲文天祥的《正气歌》时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的精髓；数学老师季绳武讲高中平面几何、范式代数，从不看讲义和课本，对每个定理和例题，都讲得清清楚楚，对一些难懂的题目，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说得明白白；生物课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可是任课教师杜长泰讲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列举大量的生动事实，使同学对动植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地理老师孙崇基每讲到祖国各地某地方时，除讲地形、地貌、气候、物产和风光，必然要讲到它在国防上的重要作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其次，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国立二十一中虽在太和和安全区建立，但仍处在敌后，因此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制度。彼时，全校编成一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在军事化的管理下，学生每天的生活按号声作息。早晨从起床号开始，出操，上课，下课都听号令指挥，直到熄灯号结束。学生吃饭也是军事化的，不管严寒酷暑都是摆在院子里的地上，八个人一围，教官喊一声“开动”才能开饭。“有时夜间紧急集合，号声一响，在规定时间内，要把衣服穿好，帽子戴上，绑腿打好，有的同学慢了，就拎着皮带走，绑腿拉多长，未能按时做好，就要遭到教官的训斥，大部分的同学，是能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学生通过军事化的生活，加强了纪律，这对刚从沦陷区逃出来而又带自由散漫习性的青年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再次，学生的课余生活丰富。尽管学生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军事管理严格，但各班学生仍不断地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例如，各年級的各班級都組織編輯委員會，定期或不定期出壁報，內容多與抗日有關。1943年1月8日，學校組成以高中部為主的83名代表參加冬令營活動。2月4日春節，校本部演出話劇《雷雨》《無名英雄》等。3月學校舉行春季運動會。5月4日，學校組成代表隊參加邊區組織的論文、演講、歌咏、籃球等比賽。1944年，太和縣舉辦春季運動會，國立二十一中獲得籃球比賽冠軍。1944年6月，《國立二十一中學校



1944年，国立第二十一中初三毕业留念。

刊》创刊，该刊设置多个板块，特别是收录学生文章的栏目众多，有“学生文选”“学生日记选”“学生习作选”“笔谈”等。

最后，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疯狂的奴化教育，国立二十一中的教师注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1943年春上海淞沪战役中的部分战士经过太和，音乐老师组织学生临时学会唱《八百壮士歌》，以欢迎800壮士代表的到来。欢迎会上，同学们唱出了热泪，战士们眼睛饱含泪花。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爆发，蒋介石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电全蜀要求学校“大量发动适龄学生入伍”。为此，该校成立“国立第二十一中学知识青年志愿动员征集委员会”，同时强调志愿从军者“除遵照部定优待办法外，并得另为精神上或物质上之优待，以资激励。”校长朱全圃在“为响应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告本校同学书”中说：“知识的最大效用，就是保卫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求学的最大目的，就是要发扬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传统。”他勉励学生不要瞻前顾后，“我们要抱定为国牺牲的决心，踊跃应征，实行从军，人人能以亲临前线执戈为国为荣，杀敌为快，改革过去颓废恶习的社会，树立举国一致为国效命的新风气。”正如时人言，“在一次动员会上，校领导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的爱国将领的英雄事迹，讲到台儿庄大捷和上海八百壮士誓死守土报国的壮丽形象，继而号召同学们报名参军。记得全体师生听完报告后，群情激昂，齐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要学成继父，我要做忽必烈’等歌曲，一时人心沸腾了，当场争先恐后踊跃报名。”

此外，国立二十一中还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为整顿校风，学校督促学生增加自习时间，虽在假期内，亦严禁学生无故外出。“学生信件，除分别登记外，并详加检查，以免有不良分子，乘此假期，有所活动。”

历史价值

国立二十一中设备虽简陋，学生生活也很清苦，但由于战火的影响，学生多能刻苦奋发，“励志向上”。也正是如此，国立二十一中的创办具有特殊的意义。

首先，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教育命脉。据相关统计，国立二十一中的学生90%来自沦陷区，论籍贯以安徽、江苏、河南最多。“那时，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离家出门还是第一次，我们既高兴又害怕。”由于国立二十一中的学生大多经济来源与家庭断绝，致生活发生困难，为保证他们顺利完成学业，1944年该校依照非常时期国立等以上学校奖学金办法实施奖励，又规定确有经济困难无法缴纳，苦苦乞求免缴者仍给予特殊通融，减为缴纳一月、二月或三月者，甚至有一月未缴者还另给工作以代替。

其次，培养了学生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战爆发前我国的教育并未普及，战时教育更困难，因此学生求学不易，所以国

立二十一中教育学生应时刻本刻苦的精神，表现乐观的态度，努力向前向上去求欲学之学与应学之学。每天太阳未升起，朗朗的读书声已经在校园各处响起；晚上学生们认真整理笔记、演算习题、抄写英语及温习其他一些功课。每到星期日，很少见有学生结伴到郊外游玩，他们大多是三五成群到郊外的林中，河岸边埋头读书。1943年黄河泛滥，皖北饥荒，学校断炊。有的同学家里还能补助一点，没有补助的同学便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一天发现一枣树，枣子熟了，我真馋极了，打下一些，狼吞虎咽地吃了不少，不幸受了风寒。经医生检查，患了肺炎。无线该怎么办？张医生帮我想办法、找路子，求助于城内两家药房，我给他们买药卖药，赚个跑腿钱来治病。每天我早起，披星戴月，摸黑起床，八点左右就到了，买好药再往回赶，不容有一点怠慢，来回100多里路，这样我自己赚的钱，治好了病。”学校主体西迁后留在太和的同学由于平汉铁路被日寇占领，生活经费一时供应不上，他们只好去挖野菜，吃树叶、挖苗维持学习。诚如时人回忆，“条件差难不倒有心人。你拿一床被，我拿一床被，两床被叠在一起，就成桌子了。上面放上一块硬纸板，纸板上放上一盏油灯，我们四位同学围着这筒易桌子，席地而坐，就学习起来了。”

再次，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坦率地说，抗战前的教育大多只是注重书本知识，由此也导致了学非所用，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为此，校长朱全圃曾勉励学生读读书是青年的唯一任务，“学以致用”是读书的目的，为己为人，为公为私都有用，学校主张“手脑并用，文武合一”，因此学生皆以劳动为重要内容，举凡筑路、填操场、补墙壁，皆由教师率领学生为之，使学生不仅有科学的头脑，还要锻炼成农民的身手。1944年春，沙河上涨，堤坝岌岌可危，训导处主任及教官督率学生协助太和县政府在界集集等地筑堤抢救，“诸生深夜前往，努力工作，赢得一般人士好评。”由于师范生将来要下农村，师范部曾先后办理2所民众学校，每班有学生50人，由成绩优异的学生授课。此外，每周还出版大众壁报，由各班学生轮流担任，张贴在要道通道，“供给民众以新的消息及抗战知识”。1944年2月，学校开辟农场一所，一方面增加生产以解决学生伙食问题，一方面能使学生之实习，增多其农事经验。学校农场基地在校舍以南，分南北两区，其中北区为实习农场，南区为蔬菜区，实习区所种各作物、树苗、蔬菜等专供学生实习之用，“使学生能从实习中得来农业经验，以求与学理上两相附合，更能增加其信念，以树将来改良农业之基。”由于生活艰苦，学生吃不饱的现象经常发生，同学们意见很大。因此学生成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由各队选出学生代表组成，学生自己领米面、领菜金，监厨，这一措施实行后效果显著，保证了同学安心学习。

最后，增强了学生的爱国情怀。要争取抗战胜利，民族复兴，就要求所有的国民都具有一副热烈的心肠。“这一热烈的心肠如火如荼，烧化了所有的艰难，所有的困苦，所有的进行时所遭遇的顽强，更烧化了敌人所加于我们的野蛮的全部力量。”抗战时期国立二十一中地处抗击日寇的前沿重地，他们对于战争有深刻的认识，也最能感受到国家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现实，因此学校非常注重爱国观念培养。教师张止戈初到校时，同学们总会有这些议论。一天有位同学在课堂上问他：“我们流离失所，这怎么能‘止戈’呢？”他以极谦虚的口吻认真回答：“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就是要拿起枪来抗战到底，决不能‘止戈’。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不打内战，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这就是止戈的含义。”诚如学生所言，“这是抗战的洪炉，我们正在这里锻炼着金钢般的体魄，准备着不久的将来，杀回东北，杀尽那可恶的、汉奸、鬼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添上一些光辉，为家乡的父老们出一口闷气。想那时有许多人向我们赞颂，说道‘真正是顶天立地的中华男儿’”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本文系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抗战时期安徽省对沦陷区教育应变研究”阶段性成果）